

# 孔子探望重病弟子时,怕被传染隔着窗户握手问候 后唐时期闹瘟疫,患者自闭房门隔离,在窗户上开洞取饭 遇到疫情隔离患者 在古代早已有之

□李开周



孔子隔窗探望病中的弟子伯牛。

在《论语》第六章中,记载了孔子的得意门生伯牛得了重病,卧床在家,孔子前去探望的事情。原文大意是这样的:说孔子门生伯牛生了重病,孔子去看他。孔子没有进屋,没有走到伯牛病榻前嘘寒问暖,而是“自牖执其手”,隔着窗户抓住伯牛的手,连声哀叹:“天哪,这是命啊!这么好的人怎么能得这种病呢?这么好的人怎么能得这种病呢?”有学者就此推断,感染疫病隔离治疗,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是防疫的手段了。



中国古代有人染疫后,会把自己关在家里谢绝访客。

据《北京青年报》

## 春秋战国时期

### 孔子探望生病弟子 隔窗握手是怕被传染?

伯牛姓冉,名耕,字伯牛,为人善良,品德高尚,在孔门弟子当中仅次于颜回,经常被孔子赞赏。眼见这么一位得意门生即将病亡,孔子当然痛惜。问题是,孔子探望时,为什么要隔着窗户呢?

南宋大儒朱熹给《论语》做注说,伯牛的家属为了表达对孔子的尊重,将伯牛抬到了南窗底下,为的是孔子可以站在伯牛病榻北侧,“面南背北”地探望门生;而孔子却认为,如此尊贵的礼节只能用在国君身上,所以不愿进屋,宁可站在南窗外面,面朝北方,隔着窗户与伯牛握手。朱熹还引用了一个解释:伯牛长的是癞疮,会传染,孔子之所以不进屋,是怕被传染。

或者也有这样一种可能:伯牛不想传染别人,主动把自己隔离在一间小屋里,听见孔子来了,也不开门,孔子只好隔窗探视,并用握手的方式予以安慰。

以上三种解释,哪种解释更贴近历史呢?大多数人更接受最后一种——孔子之所以不进屋,是因为伯牛把自己隔离了。

## 后唐时期闹瘟疫

### 患者自闭房门隔离 窗户开洞用竹竿送饭菜

古代中国几千年历史中,瘟疫频发。但是,古人面对瘟疫时,也会实施隔离吗?查阅《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》一书后会发现,在中国古代,隔离的例子不胜枚举。

比如说五代十国的后唐时期,湖北随州与河南邓州闹瘟疫,许多人重度感染。为了避免再传染给自己的父母和儿女,病人要躲进房间、房门紧闭,只在窗户上开一个洞,让亲属给他们传递饭菜和便桶。亲属传饭送菜之时,也不敢跟患者接触,用一根长竹竿挑起饭篮和水壶,站得远远的,隔窗递进去。

再比如说公元12世纪金朝统治下的山东,有一年闹瘟疫,百姓十死八九,幸存者担心传染,做得更绝:“举室弃之而去。”把已被感染的亲人扔在家里不管,自己逃往他方。这样的极端做法岂止是隔离,简直就是遗弃。

## 乾隆皇帝曾发话

### 没有出过天花的王公 一律不许到承德见驾

再比如清朝,京城常闹天花,统治者畏之如虎,顺治帝和康熙帝都下过严令:“凡民间出痘者,移之四十里外,防传染也。”(吴振械《养吉斋丛录》)。官府强行将那些正在得天花的人隔离在北京城外四十里远的地方,以免传染。

史学界公认,顺治帝很有可能死于天花。在顺治驾崩之前的头一

年,后宫嫔妃有感染天花的,顺治不可能把自己的嫔妃也隔离到城外四十里,于是他隔离自己,移驾到行宫居住,让太监宫女给他送饭送炭。送饭期间,他又担心被太监宫女传染上,因此,顺治让人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进行检疫。谈迁《北游录》中就记载,只要看见哪个工作人员有一点感染天花的迹象,无论男女老少,一律驱逐出去。

乾隆号称雄才大略,也非常担心传染天花。他喜欢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接见蒙古王公,但即便到了承德,乾隆还是不敢接见那些没有出过天花的蒙古王公。他有一道圣旨写道:“如本身未能确知出痘之王公台吉(旧时蒙古王公的爵位名号,后来也用作军衔和行政区长官的称号)等,俱不可来此,若欲瞻仰朕颜,于朕出哨之时,行围之所,亦得瞻仰。”意思是说:“如果哪个王公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出过天花,千万不要来承德见驾。如果想瞻仰朕的容颜,可以在朕出去打猎的时候,站得远远地观赏。”

## 宋朝做得最尽心

### 设“居养院”收留流浪者 疫时就是“隔离宾馆”

在瘟疫面前,所有人都应该是平等的,都应该享有保护和医治的权利。顺治驱逐潜在的感染者,乾隆拒绝接见没出过天花的王公大臣,做法都非常自私,都只考虑他们自己的安全,不顾别人的死活。正确的、科学的、合乎人道的做法,应该是动用国家机器,动员国家力量,将感染者进行安全隔离和悉心救治。古代中国那么多王朝,在瘟疫隔离这方面做得最尽心的朝代,还得是宋朝。

从北宋后期开始,各个州府都设有“居养院”和“贫济坊”,这是官办的慈善机构,平常用来救助无家可归的流浪者、孤苦无依的老人和弃儿,瘟疫暴发时,则被用来隔离感染者。不过宋朝财政开支巨大,地方官府常常入不敷出,各地“居养院”和“贫济坊”的管理有好有坏,也有个别基层官吏挪用善款,甚至虚报救助名单、冒领国家补贴,往往是该救助的穷人得不到救助,该隔离的感染者没有地方隔离。

至于民间自发的隔离,在古代中国其实也是相对少见的。首先,古人医疗观念落后,除非瘟疫特别严重,传染性和致死率特别惊人,否则绝大多数老百姓都认识不到隔离的重要性;其次,汉代以后儒家文化独占鳌头,孝道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,父母染上瘟疫,儿女如果敢于将父母隔离起来,轻则会受到邻里的批判,重则会受到官府的严惩。这不但无助于亲人的健康,还极有可能加快瘟疫的传播速度。

## 民国就有家长懂得

### 儿童患上猩红热应隔离 密切接触者也会传染

在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覆灭以

后,民国时代来临了,西方科学和医疗文明传入中国,被一些有识之士宣传普及,被报刊反复报道,也被官方强行推广。

1928年春天,北京几所小学传染猩红热,卫生局、教育局和学校都没有采取任何手段,一个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学生家长上书政府:“须知隔离为肃清时疫之最要条件,各学校如有传染病发生,当即从事隔离,禁止病童入校,以减少其他儿童感染之机会,而易收预防之功。”

这个家长还说:“须知传染途径不必皆由患者直接传播而来,曾与患者共同居处之人亦有传播病菌之能力,故不仅隔离病童,其共同居处之兄弟姊妹亦当禁止入校。”最后该家长还向政府科普了几种常见传染病的潜伏期:“白喉一至七天,猩红热二至十二天,天花七至十五天,麻疹四至十九天,染疫之病童最长之潜伏期过后,方可准其入校。入校前须呈请医师证明,方可回校。”



民国时期的防疫人员集体消毒。

## 上世纪三十年代

### 发生疫情学校停课 各娱乐场所须暂时停业

1931年春天,杭州暴发流行性脑脊髓膜炎,市政府随即通令“市内各学校如有发现疫症者,全体停课”,“各公共娱乐场所暂时停止开演”,“暂将浙江省立传染病院改为隔离所,病人及接近病人之人皆须至隔离所收治,经过十日经检查后方得出所”,“民众须戴口罩并须注射预防针”。

1932年春节前后,北京再次传染猩红热,北平市卫生局在媒体刊登公告:“天坛传染病院旧址业经组织就绪,已于一月十三日正式开诊,各居住户如有发现染患猩红热病者,随时递送医院医疗。”同样还是1932年,广州市卫生局发布公告:“拟在海港检疫所南石头办公室附近,增建隔离病院。”1937年,云南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建成十几座“麻风病人隔离所”,由财政拨款全款,对麻风病人进行免费隔离医治。

如此看来,到了民国时期,在疫情防控方面,比起古代中国还是进步了许多的。